

肖像政治：1937—1949年 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像^{*}

李军全

内容提要 随着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具有内在政治属性的领导人肖像成为政治力量控制的政治公器。1937—1949年，基于政治生存环境的变化，中共在根据地、解放区的节庆活动中借助领导人肖像建构革命政权的权力象征。基于塑造政权合法性的思虑，中共适时地引进了本属国家话语系统中的孙中山等领导人肖像，并且在根据地节庆活动中频繁地使用；同时，出于宣扬政权独立性的考量，中共在节庆中有意识地突显自我领导人肖像，最终将毛泽东像视为革命政权最高象征使用在各种政治和社会生活中。

关键词 中共革命 抗日根据地 纪念日 领导人肖像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进入一个现代性元素日渐增多的成长期，体现在政治生活中，统治集团或政治力量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现代权力技术去控制政治，其中，有着特殊权力和政治地位的领导人形象受到重视。于是，在强化政权建设的时候，统治集团或政治力量便将与领导人相关的衣物、饰品和言行赋予权威，而领导人肖像因具有直接象征政治权力的鲜明个性尤受重视。那么，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政治力量中极为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认知、评判领导人肖像与自身政权的关系，如何借助领导人肖像应对复杂政治斗争局势？对于上述问题，目前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见。^①而节庆作为特殊的时间符号，往往是政治力量集中展演政治技术的节点，是挖掘这种关系的理想透视点。鉴于此，本文拟以中共根据地机关报中有关节庆活动的新闻报道和部分档案为史料来源，考察1937—1949年间中共在节庆中使用领导人肖像的情况，希冀梳理出中共借助领导人肖像建构革命政权权力象征的变化轨迹，从而提供一个观察中共在革命中进行政治权力技术运作的微观视角，或对理解中共如何取得革命胜利有所启示。

* 本文为安徽省2014年度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革命政权与乡村社会：中共控制区域节日研究”(SK2014A372)阶段性成果，以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共革命中的纪念日”(2014M550124)的中期成果之一。

① 据笔者目力所及，主要研究成果有薛云的《华北解放区春节敬奉毛泽东现象述论》(《历史教学》2010年第7期)，日本学者丸田孝志的《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1937—1949)》(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41页)和「革命の儀礼——中国共产党根据地の政治动员と民俗」(汲古書院、2013年、177—214页)。

一、政权合法性的塑造：国家领导人肖像的引进

领导人肖像是政党形象的符号，也是政权合法性的象征。早在苏维埃时期，中共便注重使用领导人肖像，当时“在红色区域的大小大小的公私场所，大多悬挂着或者说供奉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① 只是囿于时局形势，其时的领导人肖像较为单一，更多的是政党属性的一种自我表达。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国共两党在中华民国政治框架内再度携手，一致对外，拉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这种政治局势带给中共前所未有的政治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使得大量的属于国家话语系统中的政治资源涌进中共的话语系统内，具有国家民族象征意义的领导人肖像亦在其中，为革命政权合法性的塑造提供了政治契机。

抗战初期^②，为适应全国抗战爆发后急剧变化的局势，中共及其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开辟了诸如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多块抗日根据地，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无疑给中共提供了广袤的政治活动场域。每逢节庆，边区政府和群众团体均会组织热烈的庆祝活动，作为服膺统一政治象征的中华民国领导人肖像被引进根据地的各种节庆仪式中。193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延安各界召开纪念大会，会场布置简单又严肃，一座用木板临时搭建起来的司令台，四周再用布包裹着，中间悬挂世界革命和中国抗战领袖的画像，孙中山像和蒋介石像赫然在列。^③ 这是中共在节庆中公开悬挂孙中山像和蒋介石像的较早事例。此后，孙中山像和蒋介石像一同使用的事例增多，渐趋形成固定的“孙中山+蒋介石”的肖像使用模式。1939年元旦，冀鲁豫各界在沁县召开“拥蒋”大会，会场中心悬挂了孙中山像和蒋介石像。^④ 五一国际劳动节，延安各界举行精神总动员宣誓大会，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及其各机关、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妇联、工会等百十余单位到会，主席台上高悬国旗及孙中山和蒋介石之肖像。^⑤ 五四青年节，延安全市青年齐聚抗日军政大学五大队操场，举行纪念“五四”20周年活动，大会伊始，主席团向会场悬挂的孙中山像和蒋介石像敬礼，并宣读总理遗嘱。^⑥

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具有超凡的革命精神和领袖魅力，被视为革命正统的象征，因此对于民国时期任何政治力量来说，传播使用孙中山像都有特殊的政治意涵。对此，中共有着清醒的政治认知，极为注重孙中山像在节庆仪式中的政治定位，视其为国家民族的最高象征，并加以单独使用。1938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会场布置非常严肃，在新筑成的主席台上，孙中山像作为唯一的领导人肖像被使用。^⑦ 1941年双十节，延安各界在青年体育场举行纪念大会，会场入口处，旁悬孙中山巨照；大会开幕时，主席团领导全场向总理遗像致敬并恭读总理遗嘱，追忆孙中山缔造民国之丰功伟业。^⑧ 不仅如此，中共还将孙中山像与自身信仰体系中的领导人像一起使用。1938年五五学习节（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日），《抗敌报》在发表纪念文章

①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② 本文所指的“抗战初期”“抗战中后期”和“抗战后期”等时间概念，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而是为了便于行文，依据史料所作的一个粗略划分。

③ 《延安各界纪念“五一”节》，《新中华报》，1938年5月5日，第2版。

④ 《空前盛大的拥蒋大会元旦开幕》，华北《新华日报》，1939年1月3日，第1版。

⑤ 《延安各界纪念五一劳动节精神动员宣誓大会志盛》，《新中华报》，1939年5月7日，第4版。

⑥ 《延安各界青年万余人举行纪念“五四”二十周年庆祝首届青年节大会》，《新中华报》，1939年5月7日，第2版。

⑦ 《七日上午举行盛大追悼大会》，《新中华报》，1938年7月10日，第2版。

⑧ 《国庆三十周年延安盛况空前》，《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1日，第3版。

时,刊印了马克思像和孙中山像^①;1939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八路军在太行总部召开纪念大会,会场悬挂了列宁像和孙中山像。^②上述事例足以表明孙中山像在中共根据地受到重视的程度和超高的政治地位,但从使用范围来看,孙中山像并未出现在属于诸如中共建党等中共政治属性的纪念日中,意味着并未被视为最高权力象征加以使用。较之孙中山像,其时的蒋介石虽为国民政府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但蒋介石像在中共节庆中的政治地位要低于孙中山像。从根据地最初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像几乎不被单独使用,总是与孙中山像一同悬挂,且位置靠后。可见,在“孙中山+蒋介石”的肖像使用模式中,两位国家领导人肖像的政治待遇并不对等,在中共看来,孙中山像对革命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意义要远超蒋介石像。

除了孙中山像和蒋介石像,中共在节庆活动中还引入了其他国民党领导人肖像。1939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八路军政治部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五大队举办展览会,在展览第一室悬挂了抗战领导人肖像,除了蒋介石,还有林森、冯玉祥、陈诚、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③1942年延安党政军民各界举行七七事变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大会,会场悬挂了国共两党的领导人肖像,大会主席台中央高悬孙中山像,旁为林森像、蒋介石像。^④林森像在被使用时,排序竟位于蒋介石像前,这或许与其时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有关,也表明中共对蒋介石像的政治态度。另外,素有“国母”之称的宋庆龄的肖像也被引进根据地,被中共视为中国妇女的典范和象征加以使用,主要出现在三八妇女节。1939年三八妇女节,延安各界举行纪念大会,会场首先入目的是:“全世界劳动者的教育家、劳动妇女的领袖、苏联人民的国母——克鲁卜斯卡娅像,中国人民的国母、中国妇女的领袖——宋庆龄像放在主席团另一端。”^⑤1941年三八妇女节,晋察冀边区妇救会在滹沱河畔的广场上举行庆祝大会,会场布置很朴素,中央高悬克鲁卜斯卡娅、宋庆龄与邓颖超的像。^⑥较有意味的是,与上述领导人肖像受到尊重的政治礼遇不同,曾是国民政府核心领导人的汪精卫因投敌叛国,其肖像成为挞伐对象,在节庆活动中受到嘲弄。1941年七七事变纪念日,晋西北军政民各界举行纪念大会暨抗战殉国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专门制作汪精卫及其夫人跪像,摆放在烈士纪念碑前,象征着向死难烈士请罪的意涵。^⑦

孙中山等领导人像的引进,本身便是中共政权合法地位的政治象征。为强化这种政治合法性,中共还将自身领导人像与国家领导人像放在一起,共同悬挂,序列位置靠后,形成“国家领导人+中共领导人”肖像使用模式。1939年“一二·九”运动纪念日,延安各校学生和青年团体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中共中央领导出席大会,会场主席台高悬孙中山像、蒋介石像和毛泽东像,还有上面写着“一二·九”三个红色大字的灯。^⑧1940年五卅运动纪念日,行唐县组织从军大会,“当人们的眼睛转到台上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像时,大家都露出了钦敬的笑容”。^⑨1940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延安各界举行纪念大会,会场主席台悬着抗战三周年纪念大会的横联,国旗在旗杆上飘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之像面对着会场,悬挂在蓝色的幕布上。^⑩1943年春节,太岳区各界举

^① 奋思:《今年的“五五”》,《抗敌报》,1938年5月4日,第1版。

^② 《十八集团军总部举行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华北《新华日报》,1939年11月15日,第1版。

^③ 叶澜:《抗战两周年纪念展览会》,《新中华报》,1939年7月14日,第2版。

^④ 《昨日大会热烈悲壮》,《解放日报》,1942年7月8日,第1版。

^⑤ 《伟大的“三八”节日在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3月13日,第4版。

^⑥ 帆驰:《晋察冀的“三八”节》,《晋察冀日报》,1941年3月18日,第4版。

^⑦ 穆欣:《向殉国烈士致祭》,《抗战日报》,1941年7月13日,第4版。

^⑧ 《本市热烈纪念“一二九”》,《新中华报》,1939年12月16日,第3版。

^⑨ 《行唐的“五卅”从军大会》,《抗敌报》,1940年6月9日,第1版。

^⑩ 《本市举行抗战三周年纪念大会》,《新中华报》,1940年7月12日,第2版。

行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会,会场上除了悬挂中、苏、英、美国旗外,还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领导人肖像。^①姑且不论政治说服,政权合法性的塑造还需要民众的自觉认同,上述肖像使用模式对于获取民众的政治认同具有特殊的启迪意义。

与此同时,中共根据地节庆活动中保留了使用自身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像的传统。1940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延安各界举行纪念暨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会场悬挂朱德、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和刘伯承五位中共军事领导人肖像。^②1941年五四青年节,延安青年团体组织大会,群众走进会场,迎面高悬毛泽东的巨幅画像。^③1941年五卅运动纪念日,晋西北兴县各界举行“抵制仇货”大会,会场主席台悬挂晋西北地区军政领导人肖像,左面是贺龙像,右面是关向应像。^④1942年七一中共建党和七七事变(以下简称“七一·七七”)纪念日,晋西北军区直属队在兴县举行纪念暨追悼左权大会,会场悬有左权同志巨像。^⑤7月1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纪念社论,并配刊印毛泽东像。^⑥在太行根据地,由于朱德身兼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政治地位突出,朱德像使用频率最高。1940年元旦,华北《新华日报》刊登朱德的庆贺言论,并配有朱德像^⑦;1940年五四青年节,晋东南各界青年举行纪念大会,晚上举办篝火晚会时,会场高举巨幅朱德像,全场肃然致敬。^⑧有关朱德的形象描述也是充满敬重。1939年“朱德诞辰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庆贺大会。会上,朱德被誉为“八路军的慈父”;“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党员,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中最好的同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继承者”;“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黄帝最好的子孙”;“是中国社会所说的真正的圣人贤人”;“是新的圣人,革命的圣人”;“朱总司令万岁”。^⑨但是,在具有民族或国家意涵的节庆活动中,毛泽东像作为中共层面的象征,与国家领导人肖像一起使用,频率最高。上述事例表明,抗战初期中共在注重使用国家领导人肖像的同时,并没有抛弃自身领导人像,不过,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代表革命政权权力的最高象征,中央层面使用中央领导人,地方层面使用地方领导人,显然带有随意性和地域性。

至于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肖像,主要是马克思像、恩格斯像、列宁像和斯大林像。中共使用时,主要集中在苏联十月革命和七一中共建党这两个纪念日,在顺序排位上总是将他们置于中共领袖像前。1940年七一中共建党纪念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召开纪念大会,会场主席台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王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彭真和聂荣臻等领导人肖像。^⑩八一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举行大会,会场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肖像。^⑪1941年七一中共建党纪念日,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召开纪念会,全场布置庄严朴素,悬挂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巨像。^⑫晋西北纪念大会的主席台设在战斗剧社的舞台上,除标语、红旗外,会场中央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像,舞台的两侧,另

① 《元宵佳节本区各界喜庆新约》,《太岳日报》,1943年2月25日,第1版。

② 《延安各界纪念“九一八”九周年大会记》,《新中华报》,1940年9月22日,第5版。

③ 《活跃的“五四”中国青年节》,《新中华报》,1941年5月11日,第3版。

④ 刀戈:《“五卅”抵制仇货大会速写》,《抗战日报》,1941年6月7日,第4版。

⑤ 《军区直属队举行“七一”“七七”及追悼左权同志大会》,《抗战日报》,1942年7月11日,第2版。

⑥ 《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发扬毛泽东主义》,《晋察冀日报》,1942年7月1日,第1版。

⑦ 朱德:《迎接一九四零年》,华北《新华日报》,1940年1月1日,第5版。

⑧ 《晋东南万余青年热烈纪念“五四”》,华北《新华日报》,1940年5月9日,第1版。

⑨ 《祝朱副司令长官健康》,华北《新华日报》,1939年12月23日,第1版。

⑩ 《1940年的“七一”在晋察冀边区》,《抗敌报》,1940年7月7日,第7版。

⑪ 《战斗的节日》,《抗敌报》,1940年8月3日,第1版。

⑫ 《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热烈纪念“七一”》,华北《新华日报》,1941年7月13日,第4版。

外还悬挂着毛泽东像和朱德像。^①

权力威严性基于政权合法性。在残酷的政治斗争过程中，一个革命性政党是否拥有权力威严性，能否获得合法性至为重要。抗战初期，随着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属统治集团的国家政治资源开始向中共分流，这为革命政权合法性塑造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机，引入、使用孙中山等领导人肖像，有力地塑造了革命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在革命政权领导人肖像最高象征问题上，孙中山像虽被视为国家民族象征加以使用，但并没有真正地进入到中共组织内部，而中共自身领导人像也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核心，可见这一时期中共对此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认知。其实，领导人肖像作为某种政治力量的象征符号，是与中共所处生存环境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二、政权独立性的宣扬：中共领导人肖像的突显

从抗战中后期开始，伴随着军事战场和政治局势的变化，中共所处的政治生存环境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战局重心逐渐转移到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受到日军残酷的军事进攻，同时国民党内的某些当权派对外妥协对内反共的面目日渐暴露，不断发动反共高潮；另一方面较之抗战初期，中共自身实力提升明显，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政治力量日渐增强，政治影响力愈来愈大。这种政治情势使得中共意识到在政治动员过程中标识自我政权的重要性，体现在领导人肖像问题上，就是弱化非中共领导人像，突出自身领导人像，从而表征革命政权的独立性。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此后，国共摩擦冲突加剧，双方关系急剧恶化，虽未突破中华民国政治统一框架，但孙中山等国家领导人像在根据地节庆活动中的使用还是受到制约，渐趋弱化，直至隐退。此前作为国家民族象征的孙中山像使用频率最高，这时无论是使用范围，还是使用频率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除了与孙中山相关的纪念日外，大多被限于在具有国家象征意涵的双十节和具有统一战线、民族意义的纪念日上，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1944年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延安各界民众在参议会大礼堂举行纪念大会，会场悬挂孙中山像，大会伊始，全场向孙中山像行三鞠躬礼，并恭读遗嘱。^②同时，孙中山像被单独使用的事例也在减少，大多是与中共领导人肖像一起使用，虽在悬挂序列上仍处于核心位置，但更多的是彰显中共继承革命合法性的政治意愿。1944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太岳各界举行纪念大会，会场布置极为庄严，主席台正中为孙中山像，两旁悬挂毛泽东像和朱德像。^③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举国欢庆，围绕国家发展方向等问题，国共等政治党派齐聚重庆，共商国是。这种政治时局的转换给予孙中山像重新焕发活力的契机，在中共各种节庆中频频被使用，俨然成为革命政权最高的政治象征。1946年春节，延安各界举行庆祝和平民主大会，会场悬挂中、美、苏、英国旗和孙中山像。^④然而，政治局势瞬息万变。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内战。内战的爆发再次冲击了孙中山像在中共节庆中的政治地位，导致孙中山像渐趋隐退。1946年双十节，延安各界举行“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大会上虽悬挂孙中山像^⑤，但此后，孙中山像在中共节庆活动中被使用的事例几无可寻。

^① 穆欣：《中共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抗战日报》，1941年7月7日，第4版。

^② 《延安各界民众庄严集会纪念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解放日报》，1944年3月14日，第1版。

^③ 《太岳军民欢腾鼓舞热烈纪念抗战七周年》，太岳《新华日报》，1944年7月16日，第2版。

^④ 《延市两万余人集会庆祝和平民主新阶段》，《解放日报》，1946年2月4日，第1版。

^⑤ 《庆祝“双十节”延安各界万人集会》，《晋察冀日报》，1946年10月15日，第2版。

与孙中山像相比,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像弱化得更为明显,被使用的次数锐减。1943年春节,延安各界在南门外广场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庆祝大会,会场上不仅高悬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等美英苏领导人肖像,还悬挂着蒋介石像。^①此后,蒋介石像在中共组织的各种节庆活动的主席台上难寻踪迹。1946年夏,国共内战爆发,蒋介石像又时常出现在解放区节庆活动中,但已经不再是以领导人的形象出现。1946年双十节,延安街头张贴出颇具讽刺意义的漫画,该幅漫画四尺长,背景是一幅中国地图,上面雄赳赳地站着两个人:背着枪的战士和扛着红缨枪的老百姓,正在怒目地监视海岸边的一个美军:他正将一把刀子递给抱着他大腿的胆怯的“蒋介石”。^②1948年元旦,闻喜县五区的晋庄群众组织新年大会,将带有“蒋介石”字样的猪头摆放在会场中央的桌子上。^③节庆允许嘲弄,通过人物的生理变形或服装变形,夸大某些特征,寻找节庆中的滑稽效果,营造感官刺激的愉悦。显然,此时的蒋介石像成为被嘲弄、戏谑和泄愤的对象。其实,蒋介石像无论是被视为国家领袖,还是被视为嘲弄对象,似乎代表的国民党领导人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国家领导人,由此可见中共处理蒋介石像时所蕴藏的政治技巧和政治信息。

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肖像在中共节庆活动中的使用频次也在减少,使用方法较单一,总是与中共领导人肖像一起,且集中于十月革命纪念日。1943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太行军民组织盛大集会,会场附近贴满各种彩色标语,主席台上高悬中苏两国国旗和斯大林、毛泽东的巨像,象征着中苏两大民族的亲密团结。^④1944年元旦,晋绥边区各界举行庆祝大会,会场主席台左旁挂有巨幅的斯大林像,右旁挂有毛泽东像。^⑤十月革命纪念日,晋绥边区各界举行纪念暨追悼邹韬奋集会,会场主席台中央悬挂斯大林像和毛泽东像。^⑥1945年元旦,太岳区组织群英大会,会场中央高悬国旗,主席台顶正中是斯大林、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像,两旁是木制彩色的民兵英雄和劳动英雄像。^⑦十月革命纪念日,晋察冀边区及张家口市直属机关团体举行大会,会场设于华北联大体育场内,主席台上中苏两国国旗交叉,国旗下面并列着斯大林和毛泽东两幅巨像。^⑧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斯大林等国际共产主义领袖像使用频率下降,除了十月革命纪念日,其他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中被使用的事例难以追寻。虽是如此,毕竟与孙中山等领导人肖像遭遇不同,作为自身话语系统中的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肖像并未退出中共的节庆活动,只是在以中共领导人肖像为使用核心的时期,被暂时弱化了。

随着孙中山、蒋介石,以及国际共产主义等领导人肖像的使用弱化,中共各根据地摆脱了此前使用自身领导人肖像的多元面相,在节庆活动中有意识地强化自身领袖的形象和威严,渐趋形成以“毛泽东+朱德”为核心的肖像使用固定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使用于与自身相关的纪念日上,也使用在具有国家民族意涵的纪念日上。1943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延安各界在边区参议会大厅集会,主席台两侧悬挂毛泽东、朱德的巨像。^⑨这种模式还被中共在抗战后新解放的区域中加以推广。1946年春节,晋绥边区各机关与兴县大川群众举行大团拜,会场悬挂毛泽东像和朱德像。^⑩二

① 《延市军民二万人举行庆祝废约大会》,《解放日报》,1943年2月5日,第1版。

② 林间:《延安的激愤——写在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运动”第一天》,太行《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7日,第4版。

③ 《闻喜各村翻身农民庆祝运城的解放给毛主席拜大年》,太岳《新华日报》,1948年1月1日,第3版。

④ 《太行军民欢欣鼓舞庆祝十月革命节》,太行《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3日,第1版。

⑤ 《边区各界热烈庆祝元旦》,《抗战日报》,1944年1月4日,第1版。

⑥ 《晋绥边区各界盛大集会》,《抗战日报》,1944年11月10日,第1版。

⑦ 《在万人狂欢庆祝声中群英大会元旦日开幕》,太岳《新华日报》,1945年1月11日,第2版。

⑧ 《边区及张市各直属机关团体代表热烈庆祝十月革命节》,《晋察冀日报》,1945年11月9日,第2版。

⑨ 《本市各界代表集会沉痛纪念“九一八”》,《解放日报》,1943年9月19日,第1版。

⑩ 《边区级各机关同志与群众举行军民大团拜》,《抗战日报》,1946年2月10日,第2版。

七惨案纪念日,张家口总工会及平绥铁路总工会举行大会,会场主席台在交叉的国旗下面,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像。^① 七一中共建党纪念日,张家口市民生电业公司举行大会,会场正面挂着鲜红的党旗和毛泽东、朱德的像。^② 甚至,中共还将其与孙中山像、斯大林像和地方党政领导人共同使用。1944年春节,雁北各界举行拥政爱民拥军运动大会,会场主席台高扬长幅红幔,台中央平悬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像。^③ “七一·七七”纪念日,冀中六分区举行庆祝大会,会场正中高悬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巨像,国旗飘扬。^④ 1945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太岳区举行盛大集会,会场上悬挂毛泽东、朱德像和太岳区副主席薄一波、司令员陈赓像。^⑤ 从抗战后期开始,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使中共认识到突显自身独立地位的重要性,而此时的毛泽东和朱德无论是从组织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皆占有核心地位,他们的肖像被广泛使用在各种节庆活动中,自然富有更多的政治象征。

在“毛泽东+朱德”的肖像使用模式中,毛泽东像位于首要。如果说此前中共在节庆中使用自身领导人肖像问题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核心象征的话,此时便有了清晰的足可代表革命政权形象的最高象征,这就是毛泽东像。毛泽东像政治地位的提升,与其本人党内地位密切关联。延安整风运动后,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组织系统内部,毛泽东都树立了绝对权威,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这就奠定了其肖像的政治地位。1944年三八妇女节,晋察冀边区组织庆祝大会,会场主席台中央悬有一幅毛泽东巨像,左右交叉着两面国旗^⑥;“七一·七七”纪念大会,会场悬挂一幅彩色毛泽东像^⑦;双十节群众大会,会场悬挂巨幅毛泽东像。^⑧ 1945年“一二·九”运动纪念日,宣化青年组织大会,并在示威游行时,高举巨幅毛泽东像。^⑨ 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孙中山等领导人肖像日渐消退,毛泽东像成为革命政权的最高象征被加以塑造,政治影响力愈加扩大,使用于各种政治生活中,甚至在一场庆贺“朱德六十诞辰”的大会上,也与朱德像并列悬挂。^⑩ 与之相伴,乡村层面上毛泽东像借助军事胜利、土地改革等政治大势,走上乡村家庭祭祀神灵的供奉台,成为乡村民众的膜拜对象。

合法性是政权运行的首要,而独立性则是政党运作的要件。在艰难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政党的独立性不仅意味着自身政权独立实践政治行为,还意味着获取社会民众对政党认知和评价的好感。随着抗战形势和政治时局的变化,处于中华民国统治框架下的中共逐渐厘清了宣扬自我政权形象的重要性,有意识地疏离、弱化孙中山等领导人肖像,注重自身领导人肖像和使用,树立能够体现政权独立性的政治形象,这无疑是革命政权合法性的深层次展演。于是,中共在节庆中开始突显自身领导人像,肖像使用模式也开始由多元变得单一,由他者变得自我。经过辛苦的政治经营,毛泽东像作为革命政权的象征深入到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渐渐地生成一股强大的符号力量,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宣告了一个独立的新政权治理局面的到来。

^① 《昨日“二七”二十三周年张市工人盛大纪念》,《晋察冀日报》,1946年2月8日,第2版。

^② 夏圆:《紧张活跃的大会》,《晋察冀日报》,1946年7月3日,第2版。

^③ 《雁北拥爱大会上罗政委强调实际行动》,《晋察冀日报》,1944年2月20日,第3版。

^④ 《冀中六分区数千军民庆祝“七一”“七七”两大节日》,《晋察冀日报》,1944年7月18日,第1版。

^⑤ 《本区盛大纪念“七七”》,太岳《新华日报》,1945年7月13日,第2版。

^⑥ 《边区召开“三八”纪念大会》,《晋察冀日报》,1944年3月19日,第3版。

^⑦ 《纪念“七一”“七七”三大节日边区军民举行盛大庆祝会》,《晋察冀日报》,1944年7月16日,第1版。

^⑧ 《边区军民庆祝国庆节千万人发出一致呼声》,《晋察冀日报》,1944年10月18日,第1版。

^⑨ 《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宣化青年群起示威》,《晋察冀日报》,1945年12月14日,第2版。

^⑩ 《边区各界三千余人集会庆祝朱总司令六十大寿》,《晋绥日报》,1946年12月2日,第1版。

三、革命政权的象征：毛泽东像的畅销与管理

从抗战后期开始，被中共视为革命政权象征的毛泽东像便出现了社会化的倾向，开始由政治空间向社会空间扩张。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后，在与国民党军队逐鹿战场的同时，中共在各解放区实施了民主选举、土地改革等政治经济变革，极大地满足了乡村民众获取现实利益的内心渴望。面对种种实惠，乡村民众本能地催生出发自内心的感恩情，当毛泽东像深入到乡村社会时，这种感情自然地与其联结在了一起，加速了毛泽东像走进乡村生活的步伐。诚如冀东的翻身民众所言：“我整八年没吃饺子了，要不是毛主席，那[哪]吃着饺子？又有吃，又有穿，今天分的大镜子摆在屋里豁亮一大片”；“今年和每年不同，每年这时候正在发愁，要账的又该上门了，不知往那[哪]里躲，还敢在这儿讲话。今年皮袍也穿上了。要不是毛主席，咱们那[哪]有今天”。^①这种社会现象在华北解放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通常来说，乡村民众在尊崇领袖人物时，总是喜欢借助具象化的事物、仪式和行为表达感情，对普通的翻身民众更是如此，他们认为理想可行的途径就是借助毛泽东像传达情意。1946年七一中共建党纪念日，长治小河村的村干部从城里买来一卷毛泽东像，在村公所挂了起来。这一消息传散开来，全村群众纷纷到村公所看毛泽东像，因为经历反奸、减租、翻身的群众都非常遗憾没有见过“毛泽东像”。全村男女老少很快地挤满了村公所，有的在默默敬礼，有的拍手欢呼，甚至有的跪在地上叩头。此消息又传到了相邻的宋壁村，村长张四好等六人便到小河村看像，看后他们还觉得不够，想买几张回去挂在村公所天天看，经区干部和小河村干部商议，卖给他们三幅。张四好等人回村后，先把村公所收拾了一番，把像挂起来，在像下边张贴上纸花，摆上桌子、椅子、镜子、花瓶、茶杯、茶壶。村上老百姓像一窝蜂似地都来看，都跑来敬礼，都说来祝寿，因为这天正是穷人的救星伟大的共产党“七一”生辰，有的在像前敬礼，张四好说：“你们敬礼，咱们叩头！”说着就跪下磕头。^②

上述事例仅是解放区民众追崇毛泽东像的生活缩影之一。其实，在注重实际的乡村民众心目中，追崇毛泽东像不单纯是对新政权政治认同的象征，更多的是长期信奉的神灵无法满足内心渴望的宣泄，正如河南济源的一位翻身民众所言：“敬泥像敬了几辈子，辈辈穷，今年有了土地、房屋，这是毛主席送来的，我看请毛主席坐在咱的神位上去吧！”^③又如冀东的一位翻身民众所言：“我们几辈子买财神爷，财也没到过我手，这回我算明白了，什么也不像毛主席。”^④甚至，信仰耶稣的民众也不信了，新庄子信耶稣的民众都说：“毛主席叫咱们发财，就信毛主席。”^⑤因此，“功利性的神灵信仰与现实利益的满足相结合，使‘毛主席’这一活神取代了传统神灵而走上华北解放区农民的供奉桌，成为他们春节祭拜仪式的主角”^⑥，毛泽东像遂成为乡村春节期间最为畅销的领导人像。

1947年春节，涉县漳南镇集市上乡村民众争着购买带有毛泽东像的农家历。^⑦阳城东关市集上也出现乡村民众抢买毛泽东像的场面。^⑧济源承留、武山、庙街、尚庄等集市上同样出现乡村民

① 《翻身年有吃有穿》，《冀东日报》，1948年3月3日，第2版。

② 《看毛主席像》，《晋绥日报》，1946年7月15日，第4版；马逢顺：《长治人民眼中的毛主席》，太行《新华日报》，1946年7月1日，第4版。

③ 《过春节再不烧香敬神》，《人民日报》，1947年1月27日，第2版。

④ 《农民和毛主席》，《冀东日报》，1948年3月3日，第2版。

⑤ 《农民和毛主席》，《冀东日报》，1948年3月3日，第2版。

⑥ 薛云：《华北解放区春节敬奉毛泽东现象述论》，《历史教学》2010年第14期，第40页。

⑦ 《翻身农民拥挤办年货，报大恩争买毛主席像》，太行《新华日报》，1947年1月23日，第2版。

⑧ 《阳城除夕一片新气象》，太岳《新华日报》，1947年1月23日，第2版。

众争买毛泽东像的景象。^① 1948年春节，冀东比古岫等村民争着买毛泽东像，200张像一扫而光，迁西才庄等村民听说新华书店正印毛泽东像，除夕竟然跑出20里路，一夜未休，而毛庄等14个村的民众正开会时，听到毛泽东像拿来了，停止了会议，开始争抢毛泽东像。^② 玉田李模铺正月初三过会，民众抬着镶玻璃镜框的毛泽东像游行，邢庄李景看到后说：“明天我也上鸦洪桥买个毛主席像去。”^③ 宁武二区头马营行政村干部王永明拿着一卷毛泽东像参加会议，民众争着抢买；二区公所通讯员拿着四张毛泽东像到了细腰村，民众争着要买，贫农毛仁说：“我早就想买，问不下个地方，现在我非买一张不行。”^④

毛泽东像的畅销，给它的印制、冲洗、出版、销售等环节带来了经济实惠。不管是民间集市，还是社会机构都开始印制毛泽东像，但过多地追逐利益，忽略了画像本身的质量，使得解放区乡村市场上出现了大量技术粗糙、质量低下的毛泽东像。这些画像的最大问题是毛泽东容颜印制不清。对于此种情形，一位民众说：“我在阳城街上那些小货摊上，看见摆着很多领袖像，要是上边没有‘毛主席’三个字，谁也不会认成这就是人民领袖毛主席。我想倒（刻印）这些领袖像的人，只是为了自己赚钱，就不是为了叫大家拥护、尊重领袖。我记得咱报上还登过，以后各地方印些领袖像，都要经过审查。我觉得倒这些领袖的小像，也应该有个规定，不能随便倒上个像，为了赚钱，不管像不像，就刻上‘毛主席’三个字，拿到街上去卖。”^⑤ 另一位民众也描述道：“最近我在沙河看到有些村庄挂的毛主席等领袖像，画得不够精细，如石岗农村剧团的领袖像就是这样。群众看了后反映说：‘这画得可不像，挂上这样的像，表达不了我们敬爱尊崇人民领袖的心意。’另外，就是各地书店、印刷厂印的领袖像，有时也很粗糙。”^⑥ 甚至，有的村还出现“画毛主席像不经上级批准而由个人心情乱画领导像”^⑦ 的现象。

形象是政党从政的资本，良好的领导人形象总是有利于政党获取社会声望。对于上述情形，中共有所发觉。1948年2月，太行区漳南镇文化书店未经上级审核出版了一套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三位中共领导人像，上级发现此事后，检查了这批领导人像，发现“毛泽东像”中的毛泽东面带愁容。^⑧ 1949年春节，中共建屏县委宣传部指出：“近来发现个别地方有任意冲洗未经审查选择的毛主席像片出售；同时各地有不少毛主席的画像，画得很不像，或贴的地方不适宜，这种对人民领袖的画像不仅不严肃地张贴，甚至随便乱画的现象。”^⑨ 5月，中共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在一份通知中也指出：“最近在集市上，发现有些商贩，出售领导人像的徽章，样式杂乱。例如：毛主席像下面印上‘儿童团’或‘妇女会’、‘工友’、‘学友’等字样，更严重的是，有用国民党党徽（十二角太阳）制的。”^⑩ 在革命政权象征意义上，粗劣低质的毛泽东像不只是对领导人形象的亵渎，更是对政权威严性的损害，中共开始制定、颁布相关规定，统一管理、规范领袖像。

1949年1月，接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的指示，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发出《关于今后各地印售、冲洗、绘画、张挂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和像片》的通知，文中指出四条相关规定：

^① 《济源群众不敢死神敬活神》，太岳《新华日报》，1947年1月23日，第2版。

^② 《农民和毛主席》，《冀东日报》，1948年3月3日，第2版。

^③ 《翻身农民敬爱毛主席》，《冀东日报》，1948年3月15日，第2版。

^④ 《宁二区群众争着买毛主席像》，《晋绥日报》，1948年2月21日，第2版。

^⑤ 《不该乱倒领袖的小像》，太岳《新华日报》，1948年5月7日，第4版。

^⑥ 《画领袖像要慎重》，太行《新华日报》，1948年10月3日，第4版。

^⑦ 《修武县委关于入城宣传及人民报社几个问题检讨“两个文件”学习检查报告》（1949年3月14日），河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C5/3/385/2。

^⑧ 《通报》（1948年5月14日），河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C5/4/719/7。

^⑨ 《通知：领袖像》（1949年2月），平山县档案馆藏，革命档案，1/1/59/3。

^⑩ 《通知：严禁乱画乱卖毛主席像》（1949年5月2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248/1/19/6。

一、今后凡冲洗出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照片，必须送我们转送华北局宣传部审查批准（部队送政治部转华北军区政治部审查批准）。

二、各地如需在公共场所或群众集会上绘画或张挂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时，须经区党委或地委宣传部审查批准，应注意严肃整齐，位置适中，不得随意张挂、绘画。

三、各地应即检查所有画在或张挂在公共场所的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所有在各地公私照相馆、酒店、文化社出售之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或照片、证章，凡印的不好、照的不好、张挂位置不适当者均应取消和禁止出售，并应另行选择适当地点，重新张挂绘制。

四、一切公私生产部门、营业部门不得以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片印在生产品上作为商标。^①

1月30日，冀中区委宣传部转发上述通知，并增加规定：“各种书刊、小册子等如需要印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像时，事先必须送来区党委宣传部审查批准。”^②2月，冀中九专署发出《关于不准任意刷洗、出售与绘画悬挂人民领袖像》的指示，规定了领袖像的冲洗出售、使用场所和悬挂位置，所有一切不适当地使用，必须取消。^③4月，南口专署公安办事处发出通报：“要详细检查贩卖及带伟人像的人，不适合的一律没收；凡佩带的伟人像必须得像本伟人，否则没收；还要通知各机关、各部队、学校，要认真检查一下，不符伟人相貌者，一律禁止佩带。”^④5月，中共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发出《严禁乱画乱卖毛主席像》的通知，内称：为了禁止各种不尊重革命领袖像乱制、乱印杂乱徽章的现象，允许售卖新华书店正式印制的有毛泽东像的徽章，如非新华书店印制，必须“像样正确并毛主席像下边印有毛主席或为人民服务等字样者，可仍配印”，否则应立即禁止。^⑤

上述管理规定对于规范毛泽东像的使用、塑造革命政权形象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处于战时环境，加之社会技术条件难以满足印制领导人肖像的需求，毛泽东像的管理产生的实际效果有限，劣质的肖像依然流行。1949年4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在给冀中区委宣传部的一封回函中指出：“关于颁发标准领袖像的问题，我们正在积极进行中，但要制作成为标准像，自然得花费一些较长的时间，故在此青黄不接期中，市上所流行的领袖像，只要不是太潦草、难看的，便让其暂时存在一个时期，待将来标准像印出后，再行正式取缔好了，建议政府过问这一事情的意见，当亦需要在标准像出版有所根据时，再用行政力量监督较好。至于领袖像不应用作商标一事，我们和军区政治部已有通令，并即建议政府公布命令，通令各地实行，政府通令未发出前，你们亦可按华北局通令精神协助行署处理。”^⑥在毛泽东像管理上，中共面临的尴尬局面由此可见一斑。

节庆生活是乡村民众最为关注的社会层面，革命象征愈接近节庆生活，愈能影响民众的言行习惯。显然，作为革命政权象征的毛泽东像不只是接近，而是已经融入民众的节庆生活，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关于此种现象，马克斯·韦伯指出“服从具有魅力素质的领袖本人，在相信他的这种魅力的适用范围内，由于个人信赖默示、英雄主义和楷模榜样而服从他”。^⑦这种社会心理的直接效

① 《通知：新宣字第4号》（1949年1月21日），河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G5/1/107/18。

② 《关于冲洗、绘画、出售、张贴毛主席、朱总司令照片、肖像的规定》（1949年1月3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3/1/119/33。

③ 《关于不准任意刷洗、出售与绘画悬挂人民领袖像的指示》（1949年2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16/1/42/1。

④ 《关于禁用伟人像及其没收方式的通报》（1949年4月18日），河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229/1/7/8。

⑤ 《通知：严禁乱画乱卖毛主席像》（1949年5月2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248/1/19/6。

⑥ 《关于颁发标准领袖像的问题给冀中区委宣传的函》（1949年4月26日），河北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585/1/22/6。

⑦ 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1页。

果就是带来了毛泽东像的乡村流行和崇拜。与此同时，中共颁布法令，规范领导人肖像，尝试将其使用纳入到一个标准化的程序中，藉此表明革命政权的威严性，可是现实条件又限制了主观意愿的完全实现。虽是如此，对于中共而言，看重的是自身政权象征符号在乡村社会中的流行，注重的是自身政权形象在乡村社会的塑造，无论画像质量优劣，都是革命政权获得民众认同的一种表征。

四、结语

随着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有着内在政治属性的领导人肖像成为政治力量控制的政治公器，被使用在政治场合和社会生活中。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新中国诞生，中共在节庆活动中有意识地借助领导人肖像服务政治大局，以此展演革命政权的权力象征。出于塑造政权合法性的思虑，中共适时地引进了本属国家话语系统中的孙中山等领导人肖像，并且在根据地节庆活动中频繁地使用，这无疑是革命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政治象征。合法性只是革命政权存在的前提，倘若革命政党要真正地发展、壮大，必须保持独立性。当战场和时局出现较大转折时，独立性对革命政党运行的意义尤为重要。出于宣扬政权独立性的思虑，中共在节庆中有意识地弱化了其他领导人肖像，突显自我领导人肖像，最终将毛泽东像视为革命政权最高象征推广在各种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这无疑是革命政权独立性的集中表达。领导人肖像毕竟只是一个政治象征，其意义大小与背后的政治力量强弱密切相关。纵观1937—1949年中共节庆中的领导人像，反映了由国家领导人肖像引进、弱化到突显自身领导人像的变化轨迹，其实是中共自身政治力量变化的一种反映。当政治力量弱小时，革命政权权威性主要“通过传统、宗教约束力、继承权以及程序来获取”^①，所以中共借助国家正统领导人形象塑造革命政权的合法化；当政治力量强大时，中共无须再借助其他领导人形象论证自身的合法性，独立地使用自身领导人形象便是政权严性的表达。显然，在如何控制领导人肖像服务革命政权问题上，中共表现出一种深远的政治思虑和成熟的政治智慧。

领导人肖像“具有使事物合法化，起导向作用的特性”^②，在政治力量适度的权力运作下，这种特性会对政党发展或国家建设有所帮助，处于革命年代的中共便是借此建构革命政权的政治形象。但是，倘若这种特性与民众中的神灵信仰结合在一起的话，就会衍生出神权政治，即一个建立在神灵崇拜基础上的领导人肖像，不管是通过何种方式表现出来，整体也好，多元也罢，都会使构成现代化国家所有权威体系的基础观念形成一个纯粹的单一的价值判断。在这个价值观念中，领导人内化为国家合法化的代表，政治象征的参照物，其智慧和才能上升到无所不能的社会境遇，其一言一行都被烙上至高政治权威的印迹，造成领导人肖像崇拜的政治文化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社会中一度显现的领导人肖像崇拜便是解放区民众追崇领导人像的延续，本质是此种价值观念机制作用的结果。其实，领导人肖像仅仅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它自身不能进行政治意义和社会效应的生产，需要政治力量的介入与强化，需要政治精英不懈的运用与演示，需要权力技术的重复与操演，才会产生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只要使其丧失或断裂政治操演，将其与政治势力的关系保持在既能服务政治又能远离崇拜的限度内，领导人肖像崇拜现象便会得到有效的消解。

[作者李军全，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詹姆斯·麦格留戈·伯恩斯著，刘李胜等译：《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版，第27页。

^② 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论意识形态操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32页。

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No. 1, 2015

Preamble *Gao Shihua* (3)

Struggles between Yan Xisha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ural Areas of Shanxi Province—Focusing on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in Southeast Shanxi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ang Kuisong* (4)

Both Yan Xishan and the CCP paid high attention to rural problem. Yan independently controlled and administered Shanxi for twenty years long. This perhaps had relations with his care of the problem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Yan's rule was still built on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Therefore,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defense the Communist movement factually was to prohibit the CCP to carry out public and legal activities in Shanxi.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broke out, the CCP entered by both public and secret ways into Shanxi, and got involved publicly and legally in works of mass mobilization, mass organization and mass militarization. This naturally resulted in conflicts and confrontations between the CCP and the traditional old forces. From any angle, the CCP needed to win over Yan Xishan to maintain a neutral position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forces, including in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CP relations. Therefore, the CCP did not actively and initiatively take any actions to destroy the policy of keeping the united front relations with Yan, but tried more than once to repai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wo sides. However, because their ideas and viewpoints, and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were different, because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personnel of both sides at different levels to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were different, in particular because the starting points for both sides to cooperate were different,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of maximizing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in the end moved to rupture.

A Study of Grain Problem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uang Zhenglin* (40)

Though the environment of grain production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located in the Loess Plateau is not very good, the CCP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Border Region, in order to bridge over the most difficult period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made great endeavors to increase grain production and grain supplies: (1) They widely mobilized peasants and organized labor force to increase grain output through reclaiming wasteland and enlarging farmland; (2) They regulated and adjusted the system of grain administration and supply, and to the maximum extent saved grain to ensure grain supply; (3) They prohibited exporting of grain from the Region and usage of grain to make alcohol, with the aim of decreasing grain consumption. All of these measures obtained a good achievement. Firstly, the cultivated area and grain output in the Region were greatly increased. Secondly, the problem of competing for food with peasants was resolved through adjust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and through building more reasonable grain system to lighten the burden on peasants. The successful solution of grain problem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Region to bridge over the most difficult period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refore, the factor of grain production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in discussing on the problem of self-sufficiency of the Region.

Portrait Politics: The Portrai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 in Festivals, 1937 – 1949 *Li Junquan* (71)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the portraits of leaders with internal political

property became political public instrument controlled by political forces. From 1937 to 1949, considering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living environment, the CCP used portraits of leaders to construct power symbols of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in festivals in base areas and liberated areas. In order to form the legitimacy of the political government, the CCP timely introduced portraits of Sun Yat-sen and other leaders which originally belonged to the national discourse, and frequently used them in festivals in base areas. Meanwhile, in order to publiciz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political power, the CCP deliberately underlined portraits of its leaders in festivals, and in the end used Mao Zedong's portrait in vari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as the supreme symbol of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Not “Business as Usual:” The China Policies of Denmark and Sweden 1937 – 1945: A Comparison **Peter Harmsen** (82)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lthough the envoys of Denmark and Sweden in China, as almost all other foreign diplomats, did not move to the interior of China with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gether, the two countries expected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for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carried on “business as usual”. However, Denmark was occupied by Germany in 1940.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Axis powers, Denmark was forced to sever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Chongqing and turned to recognize the Wang Jingwei puppet regime. With the endeavors of the Chongqing government, former Danish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Henrik Kauffmann was appointed to be representative of “Free Denmark” in Chongqing. Therefore, from 1942 to summer of 1945, there were two Danish envoys in China. Sweden had always kept independence during the War. Though Japan frequently asked Sweden to recognize the Wang Jingwei puppet regime and negotiated with it about the abolition of extraterritoriality, Sweden did not comply. On the contrary, Sweden sent a new ambassador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Chongqing while letting the former envoy remain in Japan-occupied area, so that Sweden had two senior diplomats at the same time in China. These two starkly different historical processes indicate that external pressure from the Axis powers such as Germany and Japan played key roles for recognition of the Chongqing government or the Wang Jingwei puppet government.

The Wartime Finance’s Dilemma and Responses: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Four Banks” in 1942 **You Yundi** (94)

The Industrial Cooperations in Southeast China during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ou Haihua** (110)

Chiang Kai-shek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Outer Mongolia, 1945 – 1952 **You Shujun** (124)

In 1945, under the dual pressure of the USA and the Soviet Union, Chiang Kai-shek was forced to accept Yalta Agreement. In view of problems of the Northeast, Xinji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ang agreed to sign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allowing Outer Mongolia to be independent through self-determination. Though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eclared Outer Mongolia's independence, it did not settle the boundary between China and Mongolia, this led Sino-Mongolia relations to be strained. After the outbreak of Beitan Inciden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urned to deny Outer Mongolia's independence. It took an anti-Soviet policy and tried to get the USA's support, but put itself between two fires.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USA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lso affected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It was thereby difficult to jo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became a bargaining counter in diplomatic disputes in the Cold War situatio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Policies to Halt Japanese People’s Illicit Fishing in 1927 – 1937—Centered on the Sino-Japanese Fishery Negotiations **Liu Limin** (142)